



开栏语 再现“锦绣太原城”盛景,是领袖的殷殷嘱托,是太原人民的奋斗目标。锦绣太原,是曾经的历史辉煌,是渐次展开的现实画卷。一山一川,一街一园,一人一物……或流淌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,或洋溢着新时代新征程的气息,莫不成为“锦绣太原”的诠释和呈现。本报副刊将在各版陆续刊登系列文章,多方位展现“锦绣太原城”丰姿。今起,本版推出“锦绣太原·人物篇”系列,以独具历史意义的张孟谈为开篇。 ——编者

张孟谈一夜扭转乾坤

孙 琨

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,是三家分晋。三家分晋的形成,则源于太原历史上那场极为惨烈的历时3年的晋阳保卫战。在这场保卫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,从而改变了历史走向的是一位不知生卒年月、不知出生地、在晋阳保卫战中多次出现的赵氏家臣张孟谈。

当时晋国四卿中,智伯与赵襄子爆发战争。智伯联合韩、魏两家一起攻打赵襄子。将赵襄子最后的根据地晋阳城围困了3年,决晋、汾之水灌向晋阳。孤城晋阳陷入一片汪洋之中,洪水淹到离城头三板也就是大约两米的地方,《史记》对此的记载是:“城中甚急而炊,易子而食,群臣皆有外心。”城内一片泽国,锅灶都被泡塌,灶膛内蛙虫滋生,百姓只得把锅吊起来做饭,断粮的百姓只能互相交换子女杀了充饥。3年的困守让赵襄子失去了信心,和张孟谈说出了心里的恐惧,“吾不能守矣,欲以城下”,准备投降了。这时的张孟谈表现出了战略家的眼光和大无畏的士大夫精神,他看得清清楚楚,晋国四卿中的韩、魏不会轻易屈膝在智伯的脚下。他提出建议,自己出城说服韩、魏两家和赵襄子结成反智同盟。

对于那次赵襄子采纳张孟谈的主张,如何实施?《战国策》记述,张孟谈“阴见韩魏之君”。《韩非子》记载是“潜行而出”。《史记》叙述“乃夜使相张孟谈私与韩魏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“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”。从史书所记载可以得知,那是一个黑夜,在赵氏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张孟谈的挺身而出,无疑是赵襄子的最后一根稻草,史书中记载着赵襄子对张孟谈的态度可见一斑。赵襄子立即组织,当夜即实施。

将晋阳百姓和赵氏安危系于一身的张孟谈,是怎样从晋阳城出来到达韩康子的大营的呢?城外汪洋一片,城中被困3年,燃料、粮食已经基本用尽,张孟谈是用什么工具,在汪洋之中摸到韩康子大营?有文章称,张孟谈乘一叶小舟,这是无稽之谈。晋阳城如不是赵襄子用来对抗智伯,不会有小舟来作为交通工具。况且围城3年,即使有小舟恐也成为燃料而用来解一时之围。

大多数文章回避了这点。在晋阳城遗址处观察,汾河和智伯渠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决水灌城,决水之兵必驻于高岗或有堤防,距离也不会太近。张孟谈假设身怀绝技,游泳过来,史书上不会轻易放过这一壮举。各种想法常常让人好奇那个不平静的深夜,张孟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,怎样凭借着自身的文化修养,还有超强的身体素质,凭借什么工具涉过汪洋,见到韩康子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呢?

民间的传说有时是最合理的。故事是这样描述那一晚的:“当晚夜半时分,赵襄子依计准备好木盆、绳子,把张孟谈吊到城外,张孟谈坐在木盆中,凭着两手向韩、魏两营划去。”黑漆漆的深夜,城墙上用绳子吊下一个木盆(三年的围城,能幸存下来的木盆估计早已经破旧不堪,当是临时修理后拿来急用的)。张孟谈从城墙上用绳子放到木盆之中,用手划动,一片汪洋之中,一个小小的木盆,载着一个身心俱疲的读书人,靠着两手,划向了那不可知的敌对阵营。对方态度如何,不可知;木盆能否到达,不可知;体力能否支撑,不可知。在那一个充满危险的夜晚,凭借一身胆略,毅然而然的冲入了危险之中,张孟谈一个文弱书生,形容一句“一身是胆”亦不为过。

张孟谈成功了。张孟谈说服韩、魏两家,赵、韩、魏三家互通消息,当晚,赵襄子悄悄派出一支精锐部队,出其不意地全歼看守汾河堤坝的智伯军队,引河水灌向智伯的兵营。汹涌澎湃的洪流一下子冲垮了智伯大营,智伯惊慌失措,狼狈而逃。他的强大军队在洪水的威力下土崩瓦解。韩、魏两家的军队从高处直冲下来。在洪水冲向敌方后,晋阳城打开了大门,被困达3年的守军挥舞兵戈,冲向敌营。这是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迹。晋阳城在即将陷落的那一刻,反败为胜,一次反击即获全胜。

张孟谈用一己之力挽救了赵氏家族和晋阳城百姓。赵襄子在见到返回晋阳城的张孟谈时,《韩非子》里“襄子迎孟谈而再拜之,且恐且喜”,一个“拜”字,包含了多少深意,“且恐且喜”把赵襄子的心情描述得淋漓尽致。

晋阳城保卫战在张孟谈那一夜大无畏的出击下,以赵襄子的胜利告终。晋国的赵、韩、魏三卿的地位更加巩固。没过多久,三家分晋,战国时代开启。

而开启这个划时代分界线的张孟谈,却在晋阳保卫战后,主动辞去一切官职,退还封赏的领地,在与赵襄子坦明心迹后,飘然隐去,在晋阳西山一带隐入民间,回家种田。真正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人,是不会放弃自己心中的那份责任的。几年后,韩、魏、齐、楚四国背弃盟约,准备出兵攻赵。赵襄子找到了在肩丘耕种的张孟谈,告诉他说:“从前瓜分智伯的领地,我们分得了十座城,现在诸侯又来打我们的主意,这怎么办?”张孟谈说:“您就为我背着剑,驾着车,让我到国都去,让我住在宫内前殿中,给我大夫的官职,我去试试看。”赵襄子同意。张孟谈于是派他的妻子出使楚,派他的长子出使韩,派他的次子出使魏,派他的幼子出使齐,四方联合进攻赵国的图谋因此作罢。

图片来源:百度

潇河考

殷 安

潇河,本名小河,又称淤泥小河,古称洞涡、洞澗、洞过、同过、铜锅或同戈水等。源出平定州乐平县(今昔阳)陡泉山西麓马道岭,流经平定、寿阳、榆次、徐沟、清源、太原(县)注入汾河,全长147公里,流域面积3720平方公里,系汾河第二大支流(仅次于文峪河)。夏秋多雨,山洪暴发,最大洪峰流量1200立方米/秒,冬季雨少,下游基本断流,属季节性河流。

据《水经》及《水经注》载:“洞过水出沾县(今昔阳旧称)北山,其水西流,与南溪水合,水出南山,西北流;黑水(即寿水)西出山,三源合舍,同归一川,东流南屈,径受阳故城东,其水西南入洞过水;洞过水合黑水,又西,蒲谷水(即大小涂水)注之;又西,原过水注之;又西,经榆次县及武灌城(今陈倪村)为洞过泽。”《魏书·地形志》云:同过水出木瓜岭(该志书以此为正源,即南溪水),一出沾岭,一出大廉山,一出原过(今榆次源沟村)祠下,五水合道,故曰“同过”。言说五水,实则列举出四源。古人认为志书列举了寿阳的寿水(今白马河)。所谓寿阳,乃寿水之阳也。

历史上洞涡水在榆次源沟一带奔流出山后,水流湍急,来势凶猛,像脱缰的野马,横冲直撞,摆摇不定,无固定河道,淹没庄稼,冲毁村舍,泛滥成灾。据记载,仅大的改道就有七次。北则移至极太原县境中南部,南则移至徐沟、清源县南境。

据明嘉靖《太原县志》县境乡村图描绘记载,小河(即洞涡水)流经张花营、北格、三贤、同戈(今同过村)、刘家堡北面,在(东)草寨与东柳林庄(当时西柳林庄、西草寨、监军庄及河滩村均位于汾河西岸)之间入汾河。清雍正年间,小河从榆次张庆村南、永康镇北入太原县郃村、辛村、梁家寨、侯家寨、同过村南、北格、三贤(在村北西南向斜穿下同过村东南)、戴家堡、石沟、南吴家堡村北,在东西柳林庄与东西里解村之间,西流至旧河滩村(约明隆庆年间遭汾河、小河洪水,分出西河滩,即今新庄村)附近入汾河。后小河又在下游改道南徙,在东、西里解村南,西流至洛阳村北入汾河。清道光年间,小河从张花村南改道西流,经张花营、南格、戴家堡村南,石沟、南吴家堡村北,西南流向南马村南,入徐沟县境长头村入汾河。民国年间,潇河从戴家堡南改道西流,经石沟村南、南吴家堡村北,洛阳村和南马村之间,西流入汾河,基本与今之河道相当。

千百年来,洞涡水在所流经区域内出现了“名从水出”的一系列地名。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曰:“太原郡有府(此谓军府)十八,其一曰洞涡,驻有天兵军,后撤府后变为洞涡驿。”《旧唐书·昭宗纪》:天复元年(901)四月,氏叔琮营于洞涡驿;又云:天复元年(901)四月,汴兵大举攻太原,氏叔琮以兵三万长驱出团柏营于洞涡驿。是唐时已以洞涡名驿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曰:“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,其名本取洞过水,水之阳之洞过村是也。”洞涡驿即今之清徐县王答乡同戈站村,本为“驿”,

元朝时统称“站”,为同戈站,明洪武五年(1372)迁徐沟北关。今小店区北格镇有同过村,明嘉靖《太原县志》县境乡村图载名“同戈”,清道光《太原县志》载名“同过”,其立村时间当在明初甚至宋元。这也就是邑人戏称的:太原县有个铜锅,吃饭的就有三县(即相邻的三贤村);若用木头、筷子,有东西柳林,若用盆碗,有南北瓦窑;若用柴禾,有东西草寨……除此,寿阳西洛镇潇河畔有北东、南东两个小村,当为北洞过、南洞过之简称。颇有趣味的是,潇河流域所有“名从水出”的村庄或地名均读作“东锅”,故此,北东、南东一定与洞涡水难脱干系,源流之“洞”亦此。

民国《徐沟县志》作者刘文炳认为:洞涡之名,榆次源沟以上应为洞涡,自此以下则皆名“洞过水”。若此,徐沟“洞涡驿”又作何解,姑且存疑。问题是洞涡或同过之名,古人以为:“五水合道故曰‘同过’。其实合道之水远多于‘五水’,别说上游,仅在平川,古代就汇入了蒋谷水(今壕峪河)和涂水(金水河)等数条支流。即使是‘五水’合道,也非在相近之地域,如寿水与蒲谷水就有数十里之遥,其他支流亦类似。莫非古人在定名时走遍了该河所有流域?否则让人费解。由寿阳县北东、南东这两个‘名从水出’的村庄大胆推测,洞过水是否应为——“东过水”,即东面来的水。若此,又显过于直白。其实,我国的长江、黄河等著名河流又何不若此。

稍带说一下,过去在太原、榆次、清源及徐沟各县,均称洞涡水为小河,系比之汾水而言。这在明嘉靖《太原县志》县境乡村图、清雍正《太原县志》渠道条下及民国《徐沟县志·地理志》中均有明确记载。看来,不论是洞涡水,洞过水还是同过水,仅是古称或官方之称谓,民间皆称小河,或淤泥小河。

将小河易名为潇河,据称始于1935年同蒲铁路测量队误以小河口潇河;另据民国《徐沟县志》,1945年,当局的晋绥察分署要把洞涡水天一渠渠首工程列为以工代赈项目,欲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,考虑“小河”之名有失文雅且让人不知所云,有关部门遂以潇、小谐音而定名为潇河。由此看来,“小”易“潇”并非笔误,况且,仅凭一个测量队就能号令一条古老的河流立刻改名,并无可能。对于易名,尽管有人不认同,但我觉得将“小河”易为“潇河”,堪比乳名换成大名,何乐而不为呢?当然,也存在缺憾,常见有人误写为“萧何”。

古老的洞涡水,养育了流域内芸芸众生,同时,也不可否认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,在晋川近河村落横冲直撞,每遇雨季,犹如猛兽在野,洪水肆虐,咆哮不息,将好多村庄一分为二,将汾水搅得沸反盈天、鸡犬不宁,由于携带有大量泥沙,年复一年地抬高了汾东地面,将正常南流的汾水死命向西挤压,几近吕梁山麓。同时,太原县南截沿汾河的多个村庄被迫从河西搬迁至河东,个别甚至没于汾水之中。真是爱也潇河,恨也潇河。



今日潇河大桥

河津的三位教育家

吴 晓 征

河津历史悠久,人文积厚,历史上教育发达,曾有卜子夏、王通、薛瑄三位教育家配享孔庙。

公元前453年,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,河津为魏国皮氏邑。魏文侯的时代,孔子高足卜子夏受邀前来设教,史称西河设教,授徒三百。当时的名流吴起、田子方、李悝、段干木、公羊高等都是他的学生,连魏文侯都“问乐于子夏”,尊他为师。西河的地理位置在今黄河沿线两岸,以河津为主。

史载卜子夏传《易》,并有著作《子夏易传》传世。尤善《诗》《乐》,曾作《诗大序》。整理编订六经,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。他所传经学,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。

卜子夏的办学成就与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他的教育思想在全面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础上,又在教育目的论、教学过程论、学习和借鉴历史、慎交益友等方面有发展创新,是上承孔子、下启荀子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光辉篇章的重要一环。

卜子夏西河设教,是河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行为,开启了河津教育史上崇文崇德的思想先河,影响了2000年来河津的教育事业,对河津地区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卜子夏去世后葬在河津辛封村,今已传衍到80代,村中现存卜子夏墓及子夏祠堂。

隋末唐初,是河津历史上文化繁荣的第二个高峰。先是,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讲学河汾,在黄颡山白牛溪飞云洞设教授徒,听讲者多达数百人。他的学生绛郡通守陈叔达、隰县县尉房玄龄、巨鹿道士魏

征、马邑郡丞李靖、太原诗人温大雅、京兆士人杜如晦等,后来均成为唐初名臣。

王通在我国教育史、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,其所著《中说》,上承孔孟,下接韩愈、李翱,以达宋明理学,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承者和发扬者。时人誉称“至人”“王孔子”。王通之弟王绩号东皋子,人称“斗酒学士”。王绩以诗文名世,其诗作朴素自然,生动形象。其中《野望》一诗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篇;《秋夕喜遇王处士》纯朴自然,脍炙人口,开创了唐初山水田园诗歌的先河,对转变唐初浮艳的诗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明代,河津地域出现了薛瑄的“龙门设教”热潮,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“河东学派”。薛瑄是明初的理学大师,河东学派的创始人,“关中之学”的奠基者。他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务实的总结,在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思想基础上,确立了系统的“实学”理论和学风,对明代“实学思潮”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。他出身于教育世家,受其祖父和父亲熏陶,始终把投身教育作为自己毕生的最高志向。从40岁登仕至76岁终老,36年中直接从事教育的时间就有20年。罢官回乡后,他效法卜子夏、文中子诸先贤,将河津老城的住宅改为“南书院”进行设教活动,后改称为“文清书院”或“文清正学书院”。其时,“秦楚吴越间来求学者以百数”,造詣颇高的阎禹锡也徒步由洛阳前来拜师求教,以致出现了“从教门外尘如海”的盛况。

河津三次设教影响深远,清末民初,尽管社会动荡,但河津设教活动始终如初。

1948年,阳曲支前模范村——西黄水村的两名女子,乔装打扮,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一次十分重要的送信任务。

1948年6月,晋中战役中,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。经过学习,他成为“争取阎军工作小组”组长,积极开展争取和瓦解太原城内阎锡山部队的工作。由赵承绶的参谋长曹近谦执笔,赵承绶亲笔签名,给阎七十一师写了一封信规劝其起义。经党组织再三摸排,得知西黄水村贵元的老婆与赵承绶的二姨太常在一起打麻将,关系非不错。上级指示把贵元的老婆找回来,安排送信事宜。

杨 迅

冒险送信助策反

西黄水村有两个贵人,一个是田贵元,一个是刘贵元。本来要找的是刘贵元的老婆乔拴英,可不巧的是找回了田贵元的老婆王秀林。经组织调查,两个贵元的老婆都符合送信人的条件。乔拴英和赵承绶的二姨太是牌友。王秀林出生在太原上北关,嫁给在阎军工厂担任校检员的西黄水人田贵元,而田贵元的四弟又是阎军工厂的制枪工程师,这一背景为王秀林提供了成为送信人选的基础。经了解,她二人都是地下党员。

经上级审查批准,决定二人同时执行任务,乔拴英、王秀林领命后,深知责任重大,要完成任务,必须胆大心细,于是她俩进行了乔装打扮。乔拴英以太原商家店铺少奶妈身份把头发包精心修饰,面带浓妆,衣饰洋气;王秀林扮作朴实的村妇,假称是赵承绶家的佣人,入城理由是赵的二姨太让她出城来采购食物。王秀林在大竹篮里装上煮熟的鸡蛋和猪头肉,上面盖了一块白毛巾。王天明和韩延珍给了她俩一些大洋,让她俩过卡时打点。

次日清晨,乔拴英把信用黑纱布包好卡在头发里,王秀林也把信用信藏好,在我方人员的护送下徒步进城。她俩路经青龙关卡时,我方安排了熟人顺利通过,第二关卡曲曲镇、第三关卡新城均以对口令通过。

二人到达第四关卡草堂坪大北门时,已过中午。只见两名看守无精打采的手拄枪杆,背靠城站着,还有几名阎兵半眯缝着眼睛蹲在城门外角下。看到一位阔太太领着一个手提大竹篮的佣人要进城,两个挂枪的阎兵堵住她二人一边问话,一边搜查。她俩表面镇定,内心却惊慌,好在心中早有准备,按照事先的准备,对答如流。瘦身时,乔拴英给王秀林使了个眼色,王秀林故意把竹篮掉在了地上,篮内食物露了出来,饿极了的守门兵拥了上来。这时,乔拴英发话说:“王保姆,快把那好吃的分给兄弟们。”随后她又给了阎兵几个大洋,守门兵有吃的,有花的,便放了行。

乔拴英、王秀林二人赶到国师街的一个院子里,找到了赵承绶的二姨太,二姨太什么也不让她们说,只告知她俩另一处地址,让她们快去,她随后就到。不一会儿,三个女人在约好的地点见了面,她俩把信件交给了二姨太。二姨太告诉她俩说:“赵承绶被捕后,阎锡山日夜派人监视。”第一封信顺利地交到赵的二姨太手上,由她转交给阎军第七十一师参谋长孟璧。乔拴英、王秀林的任务顺利完成。

后来,地下党员韩宽小又送了第二封劝降信,敌工部也派人直接前往七十一师进行接洽。

双方合力做工作,七十一师决定起义。1949年4月22日拂晓,七十一师以接受新任务为名,按约定时间秘密撤离,将正面15余公里宽的阵地全部交给了我二兵团。这样一来,阎军城北的防御阵地变成了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前沿阵地。

策反成功,为解放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,并完整保存了炼钢厂、太原兵工厂、发电厂等重要工业基地,迎来了全面解放太原的曙光。

红色记忆

芝郡村的来由

聂 计 海

系舟山下,牧马河畔,有一个美丽富饶的村庄——芝郡。芝郡村位于忻州城东2公里外。

据《忻县志》记载,早在北魏时期设平寇县,治所在芝郡村南,北周大象元年(579)移置定襄。因设县百余年,撤平寇县,改为故郡。明崇祯十七年(1644)正月,阎王李自成来到忻州学道街口的明月楼,犒劳三军看戏时,与跟前的一位村民攀谈。阎王问:“你是哪里人?”此人结结巴巴,不愿回答。阎王觉得蹊跷,探究原因。为难之下村民对阎王说:“俺是平寇县故郡人,说出对大王不敬,请求大王更名。”阎王觉得言之有理。接着又问他叫什么名字,村民答到:“俺叫李芝。”阎王思村片刻对那人说:“你叫李芝,芝兰万喜荣,你们村就叫芝郡吧。”《忻州志·村名》中云:平寇到明朝末年演变为芝郡。芝郡村从北魏至今,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。

村南洪福寺,占地一亩,庙内有大雄宝殿、关公殿、龙王殿、戏台,规模宏大,在中国佛教寺庙典籍中有记载。大雄宝殿,雕梁画栋,单檐歇山顶,灰椽瓦布顶,花琉璃脊兽,正面木椽窗扇,进深15米,凹明柱,神台上端坐释迦牟尼,两边有十八罗汉塑像,地面上左右站立护法金刚二尊。现存的大雄宝殿梁上写有明朝正德年间重修,由此可见,在此之前早已建有该寺。洪福寺相传与东楼的洪济寺、东石的洪堂寺为同期、同工、同匠的古代建筑。村北北寺庙,有戏台和钟楼。据老人们讲,北北寺庙,规模相当,交相辉映。除此之外,村内还有文昌阁、观音庙、金堂庙、李氏祠堂、董氏祠堂等。芝郡村据《隋志》记载,“后齐置平寇县,并筑有城池,称平寇故郡,隋开皇十年废”。直到清光绪末年,芝郡村仍有土堡,足见其历史悠久。